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橘瑞超西行记

〔日〕橘瑞超 著
柳洪亮 译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 新疆人民出版社

橘瑞超西行记

〔日〕橘瑞超 著
柳洪亮 译

版权登记号:29—1998—03

责任编辑 李春华

责任校对 俞 康

封面设计 王国玲

橘瑞超西行记

〔日〕橘瑞超 著

柳洪亮 译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电话:2825887 邮政编码:830001

印刷 新疆昌吉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本 1/32 850×1168(mm)

印张 9.375

插页 6

字数 240千

版次 1999年2月第1版

印次 199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8—04706—0/K·597 定价:32.00元

西域探险史上的东瀛释子橘瑞超

(代 序)

杨 镰

—

在 20 世纪西域探险史上,众多身世、背景迥异的中外探险家受到西域奇异辉煌的古老文明的吸引,一次次进出于塔里木诸绿洲,一次次穿行于塔克拉玛干的荒漠死界,一次次翻越周边的高山冰岭,而其中仅有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是为宗教目的而组建的。

大谷探险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大谷光瑞伯爵是近代日本的佛教领袖之一。大谷探险队的经费完全由 1 000 万信徒的供奉支持。出于争夺中亚的需要,在大谷探险队组建之初,英、俄等国就颇为关注,并认为负有政治动机。但据至今见到的有关文献可以证实,大谷探险队和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德国格伦威德尔等并无本质的不同,当然,大谷探险队更具东方色彩,因为它显然受到中国法显、玄奘等历代西行求法高僧的影响。它的目的是调查佛教东渐史迹。而大谷探险队主要的成员、日本和尚橘瑞超,则是所有西域探险家中最年轻的一人,1908 年他第一次进入塔里木时,年仅 18 岁。这恐怕也是古今见诸载籍的年纪最小的西域经行者。

探险家完成探险活动后,就自己的探险考察写出相应的科学

报告或通俗游记,已经成为 20 世纪西域探险考察的组成部分之一。斯文·赫定的科学报告和通俗游记早已蜚声学界;斯坦因的著作虽然略少文采,却并不缺乏可读性;哪怕是那个葬身青海玉树的法国人杜特雷依,亦由助手整理出版了《亚洲高原上的科学考察》一书;离开新疆仅几年,就死于交通事故的德国人德林克尔,也用德、英两种文字出版了自己的游记《狂飙之地》。但是在西域进出两次,历时 5 年的橘瑞超,却仅有一本《中亚探险》为世人所知。虽然在生动曲折、情文并茂等方面,与其他探险记相比并不逊色,但《中亚探险》的容量毕竟与橘瑞超长达数年的探险生涯难以相提并论。

随着对西域探险史研究的日渐深入,橘瑞超的探险经历愈益受到关注。有关《李柏文书》的研究成为热点,他几次抵达罗布人的最后聚居地阿不旦的目击记,也一再被引称。现在已经到了在 20 世纪西域探险史上为橘瑞超辟置专门章节的时候。这样,我们在编刊“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丛书时,就列入了这本《橘瑞超西行记》。

由于失火,橘瑞超的考察日记等原始资料在早期就荡然无存。而因财政上出现了困境,他的西域采集品又被一分为三,许多下落不明,而今存者也因失去原始记录,存在许多疑难。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橘瑞超的西行探险过程,远不如年代更早、经历更曲折的探险家们,比如法国杜特雷依那样清晰。为了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在《橘瑞超西行记》一书中,除了以他唯一的通俗探险记《中亚探险》为核心,还编译收入了目前能见到的有关橘瑞超在西域探险活动的文章。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认识 20 世纪西域探险史,打了一口探井。这个工作是由新疆考古学家柳洪亮积数年之工完成的,并得到了专门研究 20 世纪西域探险史的日本知名学者金子民雄先生的帮助。

二

有关橘瑞超的生平,金子民雄为《中亚探险》日文版所写的序和《橘瑞超年谱》有详细的介绍。橘瑞超 1908 年 4 月乘船离开日本京都,开始了自己的西域之行。这次探险也是由大谷光瑞发起和主持的,所以被称为西本愿寺(大谷探险队)第二次中亚探险。1909 年 11 月在拉达克地区的首府列城与大谷相会,中亚探险活动告一段落。在游历欧洲后,橘氏经俄领中亚再次进入新疆,并于 1910 年 10 月 19 日抵达乌鲁木齐,这就是西本愿寺(大谷探险队)第三次中亚探险。1912 年 4 月 26 日,橘瑞超经新疆塔城出境,乘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回国,先后在中国新疆度过了 5 个年头。

橘瑞超的任务本就是与宗教有关的,最主要的一条即搜集佛经或其他佛教遗物。在这 5 年间,可以说是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他在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带回了数以千尺计的佛教经卷,在新疆各古迹遗址,发掘或购买了门类众多的文物。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李柏文书》。而橘瑞超探险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作为后继者,他一直步斯文·赫定、斯坦因、格伦威德尔等人的后尘,几乎是按图索骥式地进入前人发现的楼兰故城、尼雅遗址、库车千佛洞、高昌和交河故城……作为一个探险家,如果不算那个 LK^① 的话,他没有自己独自发现过哪个知名的古迹,至少不曾因此而为人所知。与这个特点相匹配的,是他的运气好得出奇;他的适应性和敬业精神足以成为后人的表率。

在他之前进出中亚的探险家,可以说学术准备都比他充分。

① 这个 LK 是斯坦因对罗布泊古迹的编号。L,是“LOP—NOR”的简称;K 是该地所发现的古迹的序号。虽经斯坦因编号,并不等于说这些古迹都是他发现的,比如 LA(即楼兰故城)就是赫定于 1901 年率先做了调查。

为了新的中亚探险,赫定曾专门到德国柏林大学师从于冯·李希霍芬教授。就说斯坦因或伯希和吧,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考古实践,绝非年未弱冠的东瀛释子橘瑞超可比。可橘瑞超居然在几年间一直靠“捡漏”——捡最严谨、最专业的专家的漏——让先行者侧目!

在英国伦敦见到《李柏文书》,当时已经功成名就的斯坦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自认为在 1906~1907 年交接之际,已经把斯文·赫定发现的楼兰故城“扫荡一空”,可这个文静秀气的、谁也不认识的和尚,居然就在他的鼻子底下做出了惊人之举。要知道,橘瑞超是在 1909 年 2 月于楼兰故城找到《李柏文书》的,这离斯坦因离去才仅有两年,考虑到当时只能在冬季的几个月里进出罗布荒漠,这个橘瑞超可以说正是踩着斯坦因的脚印进入楼兰故城的!① 而橘瑞超就是这样一个人,不显山露水,也没有名气之累,独自一个绿洲一个绿洲,一个古迹一个古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全靠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好运,全靠献身精神的支撑,照样成为西域探险史上的一家。与一些人相比,他更像个“荒漠独行侠”。在西域探险史上,他当然不是最成功者,但谁也不能否认,他的探险活动是别具一格的,有自己的特点。

三

《李柏文书》是西域探险史的一大热点,也是一大难点。这当然是与文书本身的独特、重要分不开的。可以说,这是在西域发现的唯一一件名著正史的名人的手迹,而且还是公元 4 世纪人所写。这封书信的作者李柏的年代比书圣王羲之(321~379)还略早些。

① 这就是说,在斯坦因和橘瑞超之间,仅有 1908 年一个冬天是罗布荒漠的探险季节。

仅此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李柏文书》是橘瑞超第一次到新疆的1909年3~4月间得自楼兰遗址的。但橘氏的第一次中亚探险的原始文献早已不存,这就为《李柏文书》种下了疑团。

关于《李柏文书》,第一个问题是对信件内容的考释;第二个问题是它发现于何地。这两个问题其实是有关联的。

对信件内容的考释,主要涉及到这样几点,即该信写于何时;收信人是哪一位焉耆王;写信的地点“海头”是什么地方等等。该信到底写于哪一年,仅就目前的资料,恐怕很难得出为所有学者都信从的结论。而这封信写于何地,是与它的发现过程紧密相连的。

在1959年之前,《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从来未出现过疑问。据斯坦因记载,在伦敦会见橘瑞超时,他出示了使人震惊的《李柏文书》,并说是得自楼兰故城的官衙(即俗称“三间房”)一道土坯墙下部离地面几十厘米的缝隙。据《沙埋中亚废墟》一书,1914年2月,也许就是因为《李柏文书》的发现,斯坦因再次进入楼兰故城,并特意看了橘瑞超所说的文书发现地点,在残墙下部还真见到了两个孔隙。这说明,斯坦因对自己的疏忽(致使漏过了重要的文书)耿耿于怀,也希冀再有所获。而这个说法在1959年受到了挑战。

在1959年7月出版的《龙谷史坛》第45期,日本学者森鹿三教授发表了《〈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森鹿三指出,在面见橘瑞超本人时,橘氏出示了一张旧照片,并说这就是《李柏文书》的出土地点。而据森鹿三研究,照片是在罗布荒原的一个位于楼兰故城以南50多公里的古遗址拍摄的。这个遗址,斯坦因于1914年也抵达过,并做了测量,还将其编为“LK”。据此,森鹿三认为《李柏文书》不是出土于楼兰故城,而是出土于LK。此说为学者接受,由于《李柏文书》明言其地叫做“海头”,从此许多地图就将LK比定为海头。

在当初,橘瑞超就说过,自己在抵达楼兰故城之后,还在它的

南方发现过一处古遗址。但人们普遍没有重视这个说法,它只是一句话,没有下文,也没有相关的具体情况介绍。而森鹿三的这个新见解正好能与其相呼应。而且《李柏文书》明言该地叫做海头,可楼兰故城并未见有海头这个别名。但这又是令人很难思议的,因为在1968年金子民雄面晤橘瑞超时,橘氏又亲口告诉金子民雄,《李柏文书》出土在楼兰故城的“泥塔”,是在泥塔下的沙土里发掘出的,出土时揉成一团。同时,橘氏还出示了泥塔的照片。由于没有原始记载可凭,时过数十年,橘氏偶然记错是完全可能的。此外,说LK就是海头,也还有一定的难解之处。

首先,这个LK是个周长仅数十米的小型城垒,只有一个门,一排建筑遗址。这不大可能是西域长史的驻节地。再有,据斯文·赫定1900~1901年对罗布荒原所做的大地测量,LK并不在罗布泊—蒲昌海的古湖岸线上,而楼兰故城却在。就“海头”这个地名的含义来说,它也与LK相距颇远。

我的看法是,《李柏文书》的确是出自楼兰故城。在楼兰“三间房”,斯文·赫定、斯坦因都出土过汉魏时期的戍守者的信稿。而LK并无这样的背景。楼兰故城就是“海头”。“海头”也许不一定是这里的地名,而只是它的地理特征。两份《李柏文书》一致提到这里就是“海头”,一件说自己“来到海头”,另一件则说是“到海头”。^①不能排除这个“海头”只含有“海子边上”的意思。就像一个人说:“我到了首都。”这里的“首都”不是地名,地名是北京,“首都”只是北京的特征之一。

不仅如此,就连“楼兰”,一开始也不是一个专有具体所指地名,它的含义最初只是“城市”、“都市”,《大唐西域记》那个著名的

① 原件写的是“到此”,但作者李柏亲笔将“此”勾去,改作“海头”。

传说“沙雨湮没曷劳落迦”，所说的曷劳落迦，^①也就是“楼兰”（KRORAINA）的转音相译，它的含义仅是“城市”。后来楼兰才成了一个特定的地名。

当然，笔者在这里提出的也只是一个假设。由于《李柏文书》出土的这些异说，笔者的下一个看法就是，不能排除《李柏文书》是橘瑞超在罗布人当中购买的，而并非是亲自采集到的这种可能。这就涉及到橘瑞超的罗布荒原的几次进出。这是我们在研究橘瑞超对西域探险史所做的贡献时，探讨推究过的问题之一。

四

毫无疑问，罗布荒原是橘瑞超中亚探险的重点区域。

在1909年冬春之际，橘瑞超曾由南方抵达了楼兰故城。他成功地找到楼兰，这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据金子民雄撰文，^②大谷从正在日本访问的斯文·赫定口中打听到了楼兰故城的经纬度，并电告在吐鲁番待命的橘氏，这就是橘氏成功抵达楼兰的前提。但橘瑞超与罗布人的密切关系，则是这一前提得以实施的关键。哪怕是在今天，有了楼兰的经纬度也绝不等于就有了楼兰故城的入门券。1910～1911年交接之际，橘氏是在罗布人当中度过的。这次他如同斯文·赫定在10年前做过的那样，由北向南，再次贯穿了罗布荒原。

橘瑞超在《中亚探险》里说过，自己曾三次抵达罗布人的“首

① 有的论者认为，“曷劳落迦”是“葛逻禄”的转译，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曷劳落迦”为沙雨湮没的时期，西域还根本就没有葛逻禄这个部族。即便单纯从语音来说，“曷劳落迦”恐怕也难以与“葛逻禄”相对应。

② 见《西域考察与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2～125页）《论大谷探险队——橘瑞超是怎样到达楼兰的？》。

府”、正在衰败中的渔村阿不旦。从 1876 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抵达阿不旦,受到罗布人的世袭首领昆其康伯克的接待,阿不旦村就成了西域探险史的“关键词”之一。

但为人们忽略的是,橘氏(还有斯坦因)抵达的阿不旦,并非普氏(1876)、赫定(1896)居留的那个阿不旦,名字是一样的,但地点不是一处。1898 年,随着昆其康伯克的去世,老阿不旦(考纳阿不旦)就废弃了,罗布人迁往一个新的聚居地——玉尔特恰普干。据我 1984 年、1992 年、1997 年在仅存的罗布人当中做的调查,“阿不旦”是罗布方言的“水草丰美、适宜居住的地方”之意,“旦”应该与中亚语言里的“斯坦”同源同义,含义为“地方”。十几个世纪以来,罗布人追随族长在罗布荒原依湖泊而居,凡族长(在清朝就是世袭五品伯克)所在的村落,便叫做“阿不旦”,所以,玉尔特恰普干也沿用了阿不旦这个名字,这就是新阿不旦。而老阿不旦——考纳阿不旦远在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东北方 3 天路程之外。在这里必须提一句的是,一些文献也将阿不旦称作“阿布达勒”,但我采访时罗布人都明确说,这是别人借谐音来骂他们的话,含义是“要饭的”、“乞丐”。他们自己绝不可能以此当作聚居地的地名。

在《中亚探险》里,橘瑞超辟出一定篇幅,记述了自己对阿不旦的观感。这是《中亚探险》最引人注目的段落之一。当然,我们已经指出橘瑞超笔下的阿不旦,与普氏、赫定的阿不旦不是同一个地方,但橘瑞超和此前抵达的斯坦因,是有数的几个到过新阿不旦并留有文字记载的探险家。更为特殊的是,新阿不旦一般认为是在 1921 年废弃的,而橘瑞超是最后一个亲身到过新阿不旦的探险家,他的描述则是阿不旦废弃前唯一为人所知的风俗画。此后的斯坦因虽于 1914 年到过罗布荒原,但这次他只到了米兰,没有再重访渔村。《中亚探险》第二十节“沙漠中的月亮”写出自己在抵达

阿不旦前后的感想和印象,^① 这是该书情文并茂的段落之一,是深深打动读者的一章。也正是因为如此,在罗布人当中,对这个外来者的记忆经久不衰。

1992年4月,我在采访年过百岁的罗布老人库万时,再次向他了解20世纪的几个罗布荒原探险家。附带说一句,在80年代,有人曾对罗布人竟不知道斯文·赫定感到惊异。但这是一个误解。因为罗布人从不叫“斯文·赫定”,而是叫做“海丁图拉”^②。库万在谈到“海丁图拉”和“斯得纳”(即斯坦因)之后,也谈了俄国维尔纳城的哥萨克军士切尔诺夫^③和某个“卡尔克里克按班的和尚朋友”。据说这个和尚从卡尔克里克的按班(即若羌县县令)^④手里买了不少古物,而按班为了这和尚,曾数次以拉差的方式派罗布人深入罗布荒原去找宝。库万说不出这个和尚是哪国人。

但是,在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的《新疆考古记》里一再提到,当罗布人奥尔得克发现了“小河”——“有一千口棺材的墓地”之后,若羌县令曾两次派罗布人到小河找宝,以便卖给日本人橘瑞超。

① 在此后的章节也写到了阿不旦,但这一节是最具体、最集中的文字。

② “图拉”在罗布方言里是“老爷”之意。1899年底,赫定在英格可力所建前进营地就叫“图拉萨干乌依”,即“老爷建的村落”。当地的蒲昌城,罗布人叫做“都拉里”。《尉犁地名图志》将都拉里释为维吾尔语“驿站”之意。但这肯定有问题。都拉里就是“图拉里克”,含义无疑是“有老爷的地方”,这是来自于蒲昌城驻节着当地驻军长官“游击”。

③ 不知为什么,罗布人对切尔诺夫的印象颇深。自1984年以来,笔者多次在仅存的罗布人当中做调查,库万、艾买提等人一再谈到这个1900~1901年随赫定考察罗布荒原的俄国人的轶事。

④ 若羌县令更换频仍。仅在1908~1911年间,就换过五六届。我们目前还不能确认这个向橘瑞超出售文物的县令是谁。不过,很可能是不止一任县令做过这样的事。

另一个参证是,斯坦因在其《沙埋中亚废墟》一书的一个注释里^①明言:1914年1月,他在若羌县城听说,1906年以后罗布人发现了一个新的、外人谁也没有到过的古迹,名叫“麦得克沙尔”^②，“据对自该地带回并卖给橘瑞超先生的物品的描述分析,似乎那里还残存有房屋废墟”。由于橘氏的日记和原始记录都已付诸六丁,所以我们不可能弄明橘瑞超发现物中到底有多少是购自当地居民的“小河”或楼兰故城的出土物了,但这个数量肯定不少。

1997年9月,罗布老人乌斯曼、亚生和热合曼都告诉我,1900年无意中闯入楼兰故城的罗布人奥尔得克,在赫定离开后,还再次到过楼兰,并有所发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橘瑞超滞留在若羌,与县令(按班)日相过从。就以上的情况看,橘氏在抵达敦煌与吉川小一郎会合前,一定在当地买到了不少的文物。当然,在敦煌、吐鲁番、库车等地,橘瑞超也好,斯坦因、伯希和等人也好,都从当地人手里买过文物,有的还是极珍贵的精品。可以说,整个敦煌藏经洞就是叫他们买空的。这本是西域探险史已经翻过去的一页。橘氏和他们的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仅是有无原始记录而已。没有,就为我们今天的研究造成了盲点。虽然几乎不可能证实《李柏文书》究竟出自何地,但它出土地点的紊乱纷纭,使我们难以排除它其实是购自罗布人的可能。^③

① 英文原版 787 页。

② 这个“麦得克沙尔”不是斯坦因去过的那个麦得克。它要比后者更靠近东北方的雅丹布拉克。

③ 在这里,笔者并非为引起争论而标新立异,只是指出还有这样一种被忽略了的可能。

五

橘瑞超的《中亚探险》、《新疆探险记》、《新疆通信摘抄》等,是我们了解他在西域探险过程的主要依据。在这几种著作里,罗布荒原是重点,但绝不是唯一可读的内容。在青藏高原的苦苦支撑;乌鲁木齐的政情与民俗;和清代新疆最后一任布政使王树枬的交往;吐鲁番的风情;库车的得意和失望……这些都以别致的韵味,细致的感受而颇具感染力。也许是因为《中亚探险》曾经过原女记者关露香的润色吧,橘瑞超的探险记的确与赫定、斯坦因的有迥不相同的特点。

作为20世纪西域探险家,橘瑞超所取的角度和视野,《橘瑞超西行记》一书已经表述得相当准确。它的价值和意义,相信认真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合乎实际的判断。

同作为西域探险家,东瀛释子橘瑞超与赫定、斯坦因等人既有共同的基础,又不时可见同行间的竞争。斯坦因在他之前到达罗布荒原,率先对米兰大寺进行了带破坏性的发掘。斯坦因以在米兰寺院攫获精美的壁画(如带翼天使)而著称于时。可是限于条件,斯坦因不可能把他剥离的壁画全部带出中国新疆,一部分只得就地以浮沙掩藏。^①他优先带走了那大于真人的佛头。1911年1月5日,橘瑞超离开阿不旦前往米兰。^②在再次步斯坦因后尘发

① 近年来,米兰的居民在历经斯坦因攫获壁画的古寺院遗址,又发现了几幅珍贵壁画——新的带翼天使。在经过实地考察后,笔者有理由认为,这也是当年为斯坦因看中,但未能带走,而橘瑞超亦未曾找到的“劫余”之物。这就是在本文中,特意提到80多年前斯一橘之争的原因。

② 那时,罗布人已经在陆续迁离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沿河攀升到米兰定居。橘瑞超前往米兰也许与这有关。

掘寺院时,发现了这部分宝藏,并顺手将其取走。这就引起了斯坦因的极大不快,他提出“这是自己的发现物”,因而有“先取权”。这个西域探险史上的小小插曲已经过去八九十年,今天读之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在当时,确实是谁也没有考虑到它真正的主人是什么态度。

对大谷探险队,对橘瑞超本人,当时英、俄列强都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和一贯态度出发,更愿意相信橘瑞超是一个以僧人为掩护的、搜寻中亚情报的特务。对这一点,大谷心里明镜似的,他曾专门致函斯文·赫定,明言要为橘瑞超直接出版英文本的游记(探险考察记),以便“立此存照”。当然,这一愿望从未实现,仅有一部记载 1910~1912 年间中亚考察的《中亚探险》可以取以为证。今天,我们已经清楚,橘瑞超中亚探险的动机的确与西域探险史的知名人物,比如斯坦因等人并无不同。在《中亚探险》第十一节“乌鲁木齐的旧友”一开始,橘瑞超就说:

从塔城至迪化府的大道,我第一次探险旅行时曾经走过,这是第二次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珍奇的事情。特别是前几年我们参谋本部日野强少佐详细记述该道旅行记的《伊犁纪行》出版,没有必要再在这里叙述。日野少佐和我旅行的目的不同,对我来说不重要的东西,在日野少佐看来也许非常重要吧。

这里其实已经道出了在追蹑佛教东渐史迹之外,他并不负有其他使命。

我们将《橘瑞超西行记》列入“西域探险考察大系”,是因为对 20 世纪西域探险史来说,东瀛释子橘瑞超是“不能略去不读的一章”。我们当然希望随着这本书的编辑出版,人们对中国西部,对中国西部今后的考察、开发,会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企盼。

西域探险考察大系

总主编 宿 白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大正 杨 镰 陈重秋 荣新江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厉 声 石晓奇 华 立 李春华

吴福环 阿拉腾奥其尔 林梅村

周 轩 柳洪亮 侯 灿 耿 昇

柴剑虹 徐文堪 崔延虎

顾 问 [瑞典] 罗 信(Staffan Rosen)

伍贺庚(Hakan Wahlquist)

[日本] 金子民雄

目 录

西域探险史上的东瀛释子橘瑞超(代序)	杨 镰(1)
--------------------------	----------

中亚探险

中文版序	橘照岭(3)
------------	----------

前 言	金子民雄(4)
-----------	-----------

一	从伦敦出发	(21)
二	在圣彼得堡的两个星期	(21)
三	从圣彼得堡到鄂木斯克	(23)
四	在鄂木斯克的三天	(24)
五	沿额尔齐斯河溯流而上	(25)
六	从陆路走向中国	(26)
七	终于踏上了中国领土	(27)
八	受到俄罗斯影响的塔城	(28)
九	不眠之夜	(29)
十	充满诗情画意的绿色原野	(30)
十一	乌鲁木齐的旧友	(31)
十二	乌鲁木齐概况	(33)
十三	走向吐鲁番	(34)
十四	地理学上的吐鲁番	(35)
十五	主仆生别	(36)
十六	天地一色的银色世界	(37)